

民国史专家力作

中统特务活动史

国民党顶级情报机构的沉浮

马振犊 林建英◎著

* 图文版 *

海内外最新解密档案
全景展示中统的前世今生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力作

中统 特务 活动史

国民党顶级情报机构的沉浮

马振犊 林建英◎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统特务活动史 / 马振犊, 林建英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55-1014-9

I. ①中… II. ①马… ②林… III. ①中国国民党—
特务组织—史料②中统局—史料 IV. ① 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127 号

中统特务活动史

作 者 马振犊 林建英
责任编辑 谢艳芝 蔡传聪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14-9
定 价 50.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第一章 中统的成立及沿革

第一节 中统成立的历史渊源	001
第二节 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	007
第三节 中统的重要发展——特工总部	013
第四节 中统局的成立	017

第二章 中统巨枭

第一节 中统教父——陈氏兄弟	021
第二节 中统老板——徐恩曾	040
第三节 中统的主要干将	056

第三章 中统的“特色工作”

第一节 反省院始末	063
第二节 知彼训练——特工训练班	074

第四章 中统与中共中央特科的生死较量

第一节 中共中央特科的成立	078
第二节 “龙潭三杰”潜入中统	082
第三节 白皮红心的中统特派员杨登瀛	087

第五章 惊心动魄的“顾顺章案件”

第一节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及其恶果	102
第二节 “牛兰事件”	111
第三节 为中统卖命求荣	115
第四节 顾顺章之死	119

第六章 抗战前夜的疯狂屠戮

第一节 毒辣的“细胞反间计”	122
第二节 反共图谋的连续失败	134
第三节 应对“西安事变”束手无策	154

第七章 由盛而衰

——抗战期间中统的活动

第一节 中统重建国民党南京地下市党部的活动	157
第二节 “特种工作会报”始末	166
第三节 军统与中统的矛盾与火拼	170
第四节 中统与汪伪的斗争与勾结	178
第五节 插手蒋介石家事 暗杀章亚若	195
第六节 坚持反共 陕北屡败	199

第八章 短波传讯

——中统的电台

第一节 中统电台的建立	212
第二节 抗战期间对“电报战”的贡献	216

第九章 洋为中用

——中统与英国情报组织的合作

第一节 中统与英国情报组织合作的开始	241
第二节 中统助英训练中国留印海员	245
第三节 中英合作建立缅甸情报网	249
第四节 SOE在中国	254

第十章 反共血债

——中统对中共南方地下党的大破坏

第一节 江西省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整合	261
第二节 破坏中共江西省委	266
第三节 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	271
第四节 偶然中捕获廖承志	276
第五节 破坏中共南委及广西工委	280
第六节 历史的教训	285

第十一章 穷途末路

——中统组织的衰落

第一节 中统的没落	292
第二节 党通局	305
第三节 最后的疯狂——国共内战中中统的反共活动	312
第四节 内政部调查局	329
第五节 收缩、逃跑与覆亡	337

[第一章] 中统的成立及沿革

在蒋介石的统治麾下，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出入各党政机关，如入无人之地；他们嗅觉敏锐，信息灵敏，出手快捷，如影随形般盯住任何可疑目标和各处角落，在一切需要下手的地方，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消除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自诩为有理论、有行动的反共专家，对被捕的反对党人士，除了刑讯逼供，更施以攻心术，用他们的“理论”加以生死威逼，官禄利诱，欲迫使对手就范；他们是在政治领域维护国民党独裁体制的一支“别动队”。这群人，就是国民党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中统特工。

第一节 中统成立的历史渊源

“特务”小议

“特务”一词，本意是指特殊任务、特别任务、特种勤务，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中国的特务古已有之，只不过称谓有所不同；尤其在明代，古代特务发展达到顶峰，其锦衣卫、东厂、西厂就是典型的特务机构。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特工界，“特务”一词和“特务”组织最早

出现在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属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这种“特务”称谓完全不含贬义，只是对其工作属性的称谓，并流行下来。如1937年1月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的《特务须知》一份文件中就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足证其词意的褒义。^[1]

使“特务”一词的含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大肆发展的特务组织。蒋介石后来组建的中统、军统，更是把特务工作摆上台面，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版的《辞海》对“特务”一词定义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类为政治敌人。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者，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的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意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特务组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军队、警察同属一种性质，是国家政权的统治工具。而中统组织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性质是当时执政党

[1] 引自新浪网“爱问”栏目，<http://iask.sina.com.cn/b/3610258.html?from=iask2>。

的一级组织，并非国家机构。那么，为什么中统与同样性质的军统都成为了民国时期专制政权显赫的统治机构并名噪一时？原因很显然，那就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所造成的“党国”不分、“党国”一家也。

蒋介石走上特工之路

蒋介石为何会热衷于实行特务政治呢？这与他统治时政权的内忧外患及个人因素密不可分。

1927年蒋介石政权奠都南京后，中国在形式上进入了统一时期；中央集权自清末被削弱以来，达到了另一个强化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版图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疆界，中国又结束了一个大分裂时期，进入一个相对集权的大一统时期。

然而，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政权，却面临着棘手的内忧外患。

首先，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比蒋介石声望更高的国民党元老有胡汉民、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他们瞧不起这个行伍出身的小字辈青年，各自心怀异胎，到处拉拢有可能倒向自己的一切力量，试图另立炉灶，与蒋介石抗衡。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分裂。另外，在



1927年4月蒋介石（左一）与王宠惠（左二）、胡汉民（左三）等人

军事方面，在马背上打下天下的蒋介石，并不能有效地统治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各地方实力派军阀。新老军阀们各自拥兵自重，成为蒋的心腹大患。

其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欲达到“以党治国”及“党外无党”的目的，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令蒋介石极为恐惧。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党”之后，与共产党公开决裂；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甚至不惜大开杀戒，实行白色恐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但却始终是蒋政权最大的威胁与忧患；蒋介石为此寝食难安，急欲彻底消灭之而后快。

最后，国民政府初创，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尤其是强邻日本和苏俄，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日本帝国主义本其侵略中国与世界的“大陆政策”，一直干扰中国的统一，阻止中国的强大。在蒋介石二次北伐时，日本故意制造“济南惨案”等事件，阻止国民政府势力北上。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几年后，便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而对北方的强邻俄国，蒋介石也从未对其放心过。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去苏联考察后，认定苏联对中国有政治野心，必须及早防备。他甚至从政治立场的分歧出发，把苏联列为中国面临的第一大外部威胁。基于上述认识，蒋介石认为必须加强集权，采取一切措施，巩固他的“国基”。

固然客观环境需要强化统治，但真正使蒋介石走上特工之路的，是其个人性格中的狂暴、偏狭、蛮干以及严密组织、注重情报搜集、以效忠个人为中心等成分，还有混迹上海滩时所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了他的“上海滩”心态倾向，以及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和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等诸多因素。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陆军预备高校，毕业后又一度进入高

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当兵。从青年时代起，他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旅日期间，蒋介石还曾两度准备赴德留学，他仔细研究过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对这个政策十分崇拜。蒋介石对“武装力量的培养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这种“尚武”思想与蒋氏倔强固执的性格相结合，造就了他一生“独裁”与“专制”的作风；而在他掌握了国民党大权以后，这种作风也随着其地位权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最具体突出的表现便是蒋氏对于强权政治的器重与依赖，为了确保并贯彻他的强权统治，蒋介石一是靠军队，二是靠特工，即从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方面依赖枪杆子与暴力镇压手段来“坐天下”。

蒋介石要建立特工组织，说起来还跟他 1923 年的访苏活动直接相关。

当年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屡次受挫后，深感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和一支自己的军队，则前途无望。为争取中国革命的成功，他决定与苏俄合作，实行联共政策，并于 1923 年 8 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孙中山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任命他为代表团团长，团员有中共主要干部张太雷以及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他们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于 11 月 29 日回国。

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的意图，是要他学习苏联治党治国的经验，以便在蒋



1924 年 6 月，孙中山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合影。

回国后委以重任，推进国共合作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在苏联经过与俄方领导人的会谈及考察，反而对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与反感。他回国后在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主流，绝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党中央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但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亦有一大收获，他没有说，却有旁证可引，那就是他对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前身）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其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之。

关于这一点，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在多年后回忆说：“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1]

这样看来，蒋介石成立特工组织的设想，确是因为受了苏联“格别乌”组织的启发。

至于为什么非要用特务来维护政权呢？在陈立夫的回忆中也谈到了他运用特务手段的动因：

“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凌，为求自保，必须有一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念过《管子》一书，可以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一切，政府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对外更不要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我们的革命是从军政时期开始，经过训政时期而进入宪政时期；

[1] 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恩曾等著：《细说中统军统》代序，（台湾）传记文学社1992年版。

亦可以说由霸道进入王道，霸道是手段，王道才是目的。但是我们的处境，非常艰困，外有帝国主义者环伺，内有勾结外力之军阀和政客，如果没有健全的调统组织，其危险太大了。”^[1]

深谙中国传统统治权谋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的情报特工组织机构的组建，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这便导致了后来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特务组织的分别出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内外矛盾冲突，演绎了这两个特工组织彼此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历史。由于指导方针的原因，国民党内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即使在其形成初期，他们的组织人事与隶属关系也是泾渭分明的。

第二节 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

国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反共“清党”期间，也就是国民党中央统局的前身，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起初，这一组织只是一个党务机关而不是一个特务机构，其规模也只是一个科组。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并通过了他的旨在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拉开了“清党”的序幕。由此，自国共合作以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国共双方合作的局面被打破，共产党人受到排挤。蒋介石不光取代共产党员谭平山做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身兼会议新设的军人部长；同时，蒋介石还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可谓一身兼数职，大权在握。

身处政治漩涡的蒋介石，兼职过多确实难以应付。于是，经过仔细

[1] 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恩曾等著：《细说中统军统》代序，（台湾）传记文学社1992年版。

权衡，蒋介石将专门处理党务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交给了他信任的陈果夫来代理，具体执行整理党务。接着，陈果夫又把他在美国学习矿务的弟弟陈立夫也拉到蒋介石身边，成为蒋的又一干将。精明能干的陈氏兄弟很快把党务工作干成了他们的“私营圈子”，形成了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特别是在与共产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练就了日后形成反共专门情报特务机构的领导能力。

早在北伐之前，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便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参加者都是陈立夫、陈果夫一系的人。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 C，而二陈英文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C”，故外人称之为“CC 系”。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二陈又秘密搞了一个小组作为“CC”的触角，开始做情报工作。但这只是二陈的“私货”，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的经费来源。他们也向蒋介石送些情报，从蒋处得到一些经费。虽然不正规，但它却是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的最初起源。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因反共“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1]新增加的人员都是 1928 年 6 月由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出来的，他们到任后具体从事“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工作。从此，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职责即开始向特务工作转化，与二陈的小组职能合并。

1928 年 1 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在全面重掌党政大权之后，痛定思痛，决定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机构，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2 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是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党务调查科专司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其秘书陈立夫为科长。不久后由张道藩、叶

[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印行：《中央党务月刊》，1928 年第 4 期。

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徐恩曾是中统历史上最有实权的领导人，他掌握中统时间最久；可以说，他是中统的灵魂人物，中统真正意义上的老板。

党务调查科成立时，人数不多，其调查任务是针对党内的派系斗争搜集情报。分为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采访股总干事初为杨剑虹，但在杨因派系斗争及涉嫌贪腐事件自杀后，总干事改由曹立瀛继任。之后，又由曾三省、张冲继任。整理股总干事初由吴大钧担任，吴升任科主任后，又改由干事濮孟九继任。^[1]后来由于反共形势的需要，调查科扩张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也搜集中共和其他政治对手的情报，继而又开设了“特工训练班”，广招兵马，扩充组织。

从此，国民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特务机构——第一个正式的专职情报机构，即“中统”组织之开始。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先后增设了两个小组，特务组和文言组。其中特务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反共活动；文言组则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其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上海杨登瀛、武汉蔡孟坚、开封黄凯），配给专用电台以供联络。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信等行业，并在基层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2]在南京，蒋介石又特别调配了二十余名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充实了调查科特务组

[1] 张文：《中统二十年》，载《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 张国栋：《中统始末记》，载徐恩曾等著：《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1992年版，第7页。

织。这样，国民党“党统”即后来的“中统”特工组织框架至此便告基本形成。到1931年7月，该科人数已达五十余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1]

调查科因属国民党中央党部，初时它的办公地点就在位于南京丁家桥的中央党部办公大楼内；因此每天出出进进的各机关人员庞杂，不利于调查科秘密活动。1930年春，徐恩曾经请示上司陈立夫同意，在紧邻南京中央饭店的中山东路5号，另找了一栋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办公地点。^[2]为了遮人耳目，徐恩曾命手下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把这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后来，他命手下在一楼临街开了一间无线电器材专卖店。这样，一来可对无线电器材的流向加以监控，二来可以赢利所得补充特务的活动经费，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正元实业社”的成员有王思诚、李熙元、张志鹏、马绍武、许少顿、高振雄、林桂庭、齐耀荣、游定一、马啸天、袁更、王正鸿、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范圭中等人，他们归同住一起的特务科负责人徐恩曾直接指挥，其中的大部分人后来便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统特务组织的骨干力量。由于党务调查科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武装力量，故在具体行动中，他们便与各地的军警部门密切配合，以执行蒋介石的“清共”方针，主要任务是破坏各地的共产党组织。

在南京，调查科依靠陈立夫之兄陈果夫的关系，受到了陈果夫过去的保镖、时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在武力、装备等方面的支持；而宪兵司令谷正伦除了为调查科输送其“政治警察训练班”的毕业生，还帮助调查科关押被捕者，他还曾聘请徐恩曾及其特务组长

[1] 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2] 这幢建筑一直原状保存到2001年，后被中央饭店的后继者拆毁。



中统起家之地“正元实业社”。这里就是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东楼，现已被拆。

顾建中在宪兵司令部兼职，极大地密切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一旦调查科发现了中共活动的蛛丝马迹，军警便配合行动，实行逮捕与关押。

1930年，徐恩曾以其在南洋大学时的同学范本中为首，在南京中山东路开设“正元实业社”为掩护，设立了第一座电台，并在上海、武汉设立了分台，建立了中统组织的秘密通讯体系。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开始后，他们又派出袁更、郑伯豪等人在北平、天津设立了分台，为蒋介石搜集情报。中统的电台系统初具规模。

国共分裂之后，在国民党的残酷打击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表面上似乎已消失，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不知从何着手对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